

量质齐升:服务业扩大开放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研究

牛怡苏 傅联英 蔡煜

(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服务业扩大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引擎和关键路径。本文从就业质量和就业数量出发,在理论层面梳理了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渠道,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地级市数据,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别考察其对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服务业扩大开放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充分就业,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提升工作胜任力、增强收入获得感、提升就业吸纳力和提高产业协同度间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服务业扩大开放主要提升了常住人口的就业质量,显著提高了侨乡、要素市场成熟度高的城市就业数量。研究结果丰富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稳就业”效应的经验证据,为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格局、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服务业扩大开放;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胜任力;收入获得感;就业吸纳力;产业协同度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6)02-0147-14

一、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随着人口少子化以及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经济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为了应对上述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在科学把握就业形势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作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战略部署。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进一步将就业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强化了

收稿日期:2025-08-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正义视角下算法价格歧视的福利损益及向善治理研究”(22AJY016)

作者简介:牛怡苏(1997—),女,河南新乡人,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傅联英(1983—),男,江西赣州人,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蔡煜(2000—),女,福建莆田人,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本文通讯作者。

就业优先战略和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导向地位。这一系列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就业扩容提质的高度重视。

服务业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关键一环,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在服务业早期开放阶段,部分服务领域仍存在准入限制较多、竞争不足和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潜在就业容量的释放。为推动服务业更高水平开放,我国自2015年起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围绕市场准入放宽、监管模式创新和要素流动便利化等方面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为提升服务业就业承载能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占比由2015年的42.4%上升至2024年的48.8%。可见,服务业持续增长,发挥了“稳就业”的作用。随着服务业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以数智化为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服务业对就业市场的牵引效应不断增强。

尽管服务业扩大开放显现出一定的“稳就业”效应,但其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际效能仍需进行系统的评估。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要求就业规模扩张,更需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职业发展通道畅通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实现就业质量提升。然而,现有研究对服务业扩大开放能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缺乏深度论证。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服务业扩大开放能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间的传导机制为何?存在何种个体或区域异质性?如何强化试点政策的长期效应?深入剖析上述问题,不仅有利于解构服务业扩大开放影响就业市场的理论黑箱,而且有助于明晰服务业扩大开放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传导路径,更有益于优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的顶层设计。

二、文献综述

(一)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本内涵

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能够满足劳动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既包含就业质量的有效提升,又涵盖就业数量的合理增长。莫荣和李付俊(2025)认为,高质量充分就业一是指劳动者拥有更满意的工作,满足劳动者个性化、多样化的工作需求;二是指劳动者拥有更高的就业技能、合理的收入和牢靠的社会保障,从而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1]。赖德胜和胡起源(2025)指出,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现为在数量上扩大就业规模,实现充分就业;在质量上确保工作岗位更稳定、劳动更体面^[2]。总之,推动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需坚持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并重,进而实现二者的同步提升。

(二)服务业扩大开放与就业质量提升

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筑牢就业质量根基,是实现稳就业的关键路径。已有文献对就业质量的衡量方式进行了充分探讨,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从劳动者主观福祉出发,Eurofound(2012)将就业质量定义为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的效用,主要对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工作环境等指标进行评估^[3]。聚焦于工作自身的内在属性,Green(2006)强调了工作强度、自主性及技能应用等是构成就业质量的客观基础,并最终影响劳动者的主观满意度^[4]。由此可见,工作满意度已成为衡量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从就业质量的提升机制来看,服务业扩大开放带来的经济效益及人力资本提升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服务业扩大开放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5]。收入增加作为改善工作体验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在服务业扩大开放背景下,本土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6],这不仅能够提高员工对企业领导者的满意度,而且提高了员工对同事及工作本身的满意度。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与就业数量增长

在开放经济下,中国以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资源优劣势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增加了就业,并减少了隐性失业^[7]。在城市层面,服务业扩大开放为中国吸引了更多外商直接投资^[8],大量外资的涌入为中国就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孙湘湘和周小亮(2019)认为,服务业对城市就业规模的创造效应会随着前者开放程度提高而增强^[9]。从企业层面看,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影响。苏丹妮和邵朝对(2021)指出,服务业开放通过竞争加剧、要素

替代与出口扩张三种方式,导致低生产率企业加速退出并出现就业收缩,而高生产率企业则实现就业净增长^[10]。同时,服务业开放通过技术溢出和成本节约两个渠道促进了制造业就业规模提升^[11],并伴随“高低技能两端扩张、中等技能收缩”的就业极化^[12]。可见,在服务业开放背景下,企业既凭借自身技术进步和外部资源整合促进就业,也通过创造新产品、布局新产业等路径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岗位^[13],从而直接推动就业数量增长。

(四)研究评述

现有文献多从就业满意度或就业数量维度出发,探讨改善就业质量或提高就业数量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制,为研究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本文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该试点政策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促进效应。相比既有研究,本文的差异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话题层面,本文基于现实逻辑与理论应然,突破了传统就业分析中数量与质量二元分割的窠臼,在落点上实现了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的统一。与本文主题较为接近的文献是孙湘湘和周小亮(2019)、苏丹妮和邵朝对(2021)、齐文浩等(2023)以及李飏和蔡宏波(2021),前三者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就业规模的影响^{[9][10][11]},李飏和蔡宏波(2021)则分析了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结构的影响^[12],均未涉及服务业开放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整合了心理契约理论、雅各布斯的外部性理论等多重理论,系统解构了服务业扩大开放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机理,完善了制度型开放影响就业规模与质量的理论传导链条。第二,视角层面,本文从“微观个体+中观城市”双维度切入,构建“宏观制度变迁→中观就业数量+微观就业质量”的跨层级分析框架。与本文视角存在交叉的文献是李飏和蔡宏波(2021)、孙湘湘和周小亮(2019),但前者仅围绕微观企业展开分析^[12],后者仅基于中观省域进行考察^[9]。本文既从微观个体层面解构了服务业扩大开放提升就业质量的理论逻辑,又从中观城市层面诠释了服务业扩大开放提高就业数量的因果链条,聚面成体地丰富了对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认知。第三,机制层面,本文揭示了“客观使然+主观感知”双重传导路径,夯实了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逻辑链。既有文献局限于技术溢出^[11]、生产率^[12]等客观使然机制,尚未关注到胜任感、获得感等主观感知机制。本文秉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论,诠释了工作胜任力、收入获得感、就业吸纳力和产业协同度在服务业扩大开放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中的传导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纵向地,剖析了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的双重效应,既拓宽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影响范畴,也增进了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前因认知。第二,横向地,解构了服务业扩大开放影响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多重机制。文章从中观城市和微观个体出发,提炼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双维度的传导机制,既丰富了机制认知,又强化了因果链条。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是一以贯之、持续推进的。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发布,北京成为全国首个试点城市。北京以“可控、可复制、可推广”为原则,在金融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等重点行业先行先试,通过市场准入、监管方式和要素配置等制度创新,为全国服务业开放积累经验,形成范式。在北京形成可复制经验后,2021年4月《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批复》发布,试点地区扩大至5个省市。2022年12月,《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沈阳等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批复》发布,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和成都成为新一轮试点城市。为深入探索服务业改革创新,2025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发布。在既有11个试点省市基础上,进一步将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合肥、福州、西安和苏州9个城市纳入试点范围。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基于“渐进式”与“试点先行”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充分发挥了“为国家试

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示范作用。通过梳理各试点城市出台的政策文件发现,服务业扩大开放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就业。第一,政策创新吸纳就业。试点城市采取了多维度、系统性的改革策略。在制度供给端,通过进一步放宽科技、电信、文化和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市场准入,并细化支持企业投融资、研发创新和人才引进等保障措施,有效增加了制度供给。在服务保障端,通过优化外籍人员创业审批流程,提升行政服务效率,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了一大批优质企业落户发展。例如,海南设立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截至2025年2月,吸引了56家港澳企业入驻并促进了本地劳动力就业。广州建成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52个,截至2023年7月,吸引了2000多名港澳青年入驻发展并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第二,业态创新带动就业。试点城市培育形成了跨境数据标注、来数加工和数字医疗康养等多种新模式新业态。在数据服务领域,上海支持临港新片区开展数据跨境操作业务,2025年上半年已促成33家服务机构落地,其中仅临科智华一家来数加工企业一年内就新增员工300名。从医疗领域来看,天津市成立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医院,引入新加坡“共享医疗平台”服务模式,直接创造了约500个与医疗相关的就业岗位。第三,跨境互认便利就业。试点城市纷纷打造综合化人才服务体系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促进境内外人才“引得进”“流得动”“用得活”。例如,广东认可港澳医师和教师等领域职业资格,截至2024年6月,约有3950名港澳专业人士在大湾区内地执业。上海推进跨区域电子权互认、人才待遇互通和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互认,打破了人才流动壁垒,进一步稳固本地人才存量、扩充海外人才增量。

相比早期服务业开放政策,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早期服务业开放政策重点围绕服务市场准入,回答了外资“能否涉足”问题;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则聚焦于服务业本土适配(如海南的跨境商业医疗保险和国际共享医院模式)、规则引领(如上海和北京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及交易规则)、标准树立(如北京的中国—新加坡跨境贸易数字化规则标准体系)和监管创新(如海南的特许药械监管模式)等层面,系统解答“涉足深度”“何以提质”问题。第二,早期服务业开放的准入领域集中于低技能要求、低价值创造的“果实低垂”行业,如连锁餐饮和零售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则重点关注高技能要求、高价值分配的“果实高悬”行业,如文娱、教育、医疗和生产性服务业。第三,相比早期以吸引外资为主的服务业开放,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更加注重引入人才和知识等高端要素,推动开放层次不断提升。相应地,早期服务业开放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其在促进就业规模扩大与就业质量提升方面的双重积极效应逐步显现。

(二) 服务业扩大开放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

基于雁形形态理论,后发国家产业发展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雁阵模式。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机理,亦可借助改进的“模式引入→本土替代→全球输出”雁阵模式加以解释,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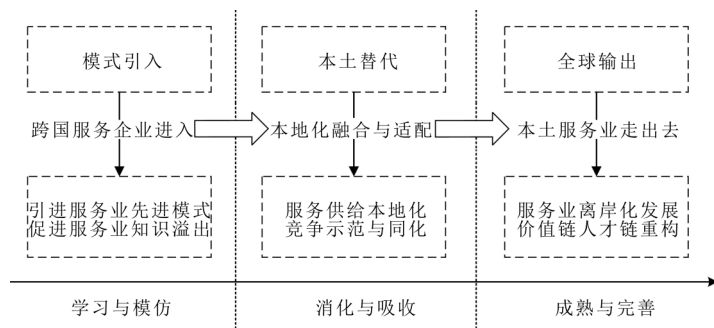


图1 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雁阵模式”

在模式引入阶段,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推动服务业开放范围向服务规则体系和服务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领域深化。例如,我国与新加坡合作探索出全环节分布式服务贸易数字化模式,海南引入境内外医疗资源共享模式,杭州借鉴互联网法院模式制定数字新业态司法保护

规则。这不仅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服务市场提供了更加开放和规范的政策环境,而且为中国企业和劳动者嵌入全球服务标准提供了机遇。一方面,外资服务企业在更宽领域进入我国服务行业,将引入更多元服务业态、更先进服务管理经验和更严格服务标准,既促进了本地企业扩大服务领域并适应高标准,又拓宽了劳动者就业渠道和提高从业层级。例如,作为首家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主导构建了具有行业示范效应的华侨金融服务体系,催生了新型的华侨金融服务业从业者。另一方面,外资服务企业拥有国际化、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与培训体系,可以为本地员工提供全球化的学习与发展机会。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能够拓宽本地员工的国际化视野,深化其对国际默会规则的认知与运用,而且有利于满足个人成长、职业发展、能力实现和人力资本增值的需求,进而从整体上提升就业满意度。

在本土替代阶段,国内服务企业通过吸收通用标准知识并将其与本土市场相融合,实现服务供给的全球化适配与本地化升级。一方面,服务业扩大开放实现了服务规则的统一和国际化嵌入,直接驱动本土服务业扩容并扩大就业。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了国内外标准对接,打破了服务业产业链在规模扩张与规则衔接上的瓶颈,由此促进了本土服务业的产业链纵深发展。本土企业突破了传统、碎片化的服务模式,产业活动和就业环节得以在全球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就业岗位逐步从低端、基础服务等局部环节拓展至研发、运营及管理 etc 全链条领域,形成覆盖中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多层次就业体系,从而推动就业实现规模化、链式化扩张。另一方面,服务业扩大开放借助竞争、示范和同化效应,倒逼本土服务企业改善员工的主观和客观福祉。服务业扩大开放激发了人才市场活力,推动服务业劳动者在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更广范围、更高频率地双向流动。人才跨企业流动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不仅促进了本土服务企业在薪酬体系和员工成长方面向上看齐,而且促使本土企业在员工获得感和前途感方面向高看齐,由此提升服务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在全球输出阶段,国内企业将成熟的服务模式和服务业态通过离岸服务或服务发包等方式,推广至国际市场。当国内服务企业在扩大开放中形成国际竞争力后,其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本土市场,而是拓展至海外市场。服务离岸化可以助推就业国际化,本国劳动者就业空间也从本土拓展至全球范围,推动就业数量增长。例如,印度在全球部署分布式软件服务中心,从承接外包向全球发包跃升,并向全球输出软件工程师。服务业扩大开放有助于厘清服务业价值链分布,在全球输出阶段能更精准地剥离低端服务环节、保留相对高端环节,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和劳动要素回报,从而在就业质量层面提升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成就感和满意度。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爱丁堡和伦敦等城市的服务业从本土走向海外,服务业收入超过制造业收入便是例证。综上所述,服务业扩大开放遵循“模式引入→本土替代→全球输出”的雁阵模式,拉动就业“量”“质”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服务业扩大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机制

1.工作胜任力。作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建设的最佳实践案例,海南省放宽外籍人员在当地就业领域的限制,重庆市创建“无境”就业模式,以支持境外人才就业创业。服务业扩大开放打破了就业创业的制度性壁垒,促进了知识要素的跨域传播,形成了国际化的学习场域并促进先进的服务理念溢出。从动态来看,服务业扩大开放加速了个体与组织层面的学习进程,服务业学习曲线下移,劳动者能够以更低的学习成本实现更高的服务效率,具体包括三个阶段:在初始学习阶段,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了显性知识标准化及溢出,使得劳动者能够快速掌握基础和通用服务技能;在稳定学习阶段,服务业扩大开放引入高标准隐性知识,劳动者通过“干中学”将默会知识内化为更高层次的岗位技能,从而能够胜任更为复杂和多元化的工作任务;在缓慢学习阶段,劳动者通过高阶岗位实践和跨境服务协作,持续积累关键经验并创新知识,拓宽技能边界,进而实现工作胜任力的跃升。

工作特征模型指出,技能多样性、任务一致性、任务完整性、自主性和工作反馈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核心维度^[14]。工作胜任力越强意味着劳动者能够越熟练、高效地完成任务,快速地解决复杂的问题。当价值认同感作为劳动者的内在驱动力时,他们更可能获得较高的工作自主性和反馈水平,提高对

工作的满意程度。同时,劳动者有更多的想法和机会去尝试不同工作内容,通过在不同的岗位上轮换,增加了劳动者的技能多样性。因此,更高的胜任力有助于劳动者胜任多样化的工作岗位,减少了劳动者因技能不足导致的职业焦虑,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适应性和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增强劳动者工作胜任力来提升就业质量。

2.收入获得感。收入获得感是劳动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与社会比较,对实际收入改善成效的一种社会感知。根据一价定律,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且不存在制度性摩擦时,同质劳动的收入差异将趋于收敛。服务业扩大开放旨在破除服务领域的制度性壁垒、推动国内国际服务市场趋于一体化,跨国服务企业在本地运营中逐步引入与总部接轨的薪酬体系,从而对本土劳动力市场工资产生齐平效应,提升当地服务业工资收入。此外,随着服务业领域在深度(非标化)和高度(高端化)上扩大开放,服务业价值链实现延伸以及攀升,服务业劳动者在高附加值服务领域中的价值创造能力不断增强,进而获得更高薪酬回报。由于收入水平与获得感同方向变动^[15],随着工资增加,服务业劳动者的收入获得感将提升。

依据心理契约理论,积极的心理契约能够给劳动者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整体福祉。一方面,更高的收入获得感有助于服务业劳动者在横向比较(与同行或社会平均水平比较)和纵向比较(与自身过往收入比较)中形成更为积极的分配公平认知,并且有利于缓解其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将心理契约的重建转化为劳动者对服务工作本身更为良好的主观评价。另一方面,收入获得感的提升反映了物质福利的实质性改善,这种积极的主观体验强化了服务业劳动者对组织未来履约行为的信任预期。在公平感知增强与信任关系稳固的双重作用下,服务业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得到强化,进而提高劳动者对劳动关系、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及职业发展的整体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假说3: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增强劳动者收入获得感来提升就业质量。

3.就业吸纳力。从开放的广度与深度来看,服务业扩大开放主要通过放宽市场准入范围、破解制度性摩擦等方式提升就业吸纳力。在广度上,服务业扩大开放体现为准入限制领域减少,外资主体进入方式不断丰富,从“合资”到“独资”“控股”“并购”多种形式并存。这不仅吸引了国际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而且推动服务业整体规模和业态范围持续扩大,为就业增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吸纳空间。在深度上,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重点优化制度环境,消除规则和标准鸿沟,使服务市场准入待遇更加公平,营商环境规则更加透明高效,为跨国服务企业注册和经营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降低了国际服务企业在本土市场的进入与扩张成本。随着服务业开放广度与深度同步推进,服务业用工需求持续增长,提升了本地服务业吸纳不同技能劳动者的能力。

基于产业关联理论,城市核心产业的就业吸纳力能够通过后向关联效应拉动上游供应商的就业增长,基于前向关联效应支撑下游企业的就业需求,并通过旁侧关联效应带动区域内相关配套产业的就业扩张,构建多方位、网络化的就业扩散格局。由此可见,跨国服务企业的进入不仅能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而且会间接带动上下游配套服务企业扩张,从而放大就业创造效应。此外,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了服务模式和服务业态推陈出新,丰富了就业结构和增加了就业岗位,进而实现就业增长。综上所述,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直接创造”与“产业联动”的双重机制,提升了就业吸纳力,从而为劳动者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和更丰富的就业选择。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

假说4: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提升就业吸纳力来促进就业增长。

4.产业协同度。产业协同是指产业间通过融合协作实现功能互补和共生发展。理论上,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辅相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提升了其服务制造业的能级,制造业集聚发展则扩大了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反之,若一方相对滞后,则会形成瓶颈制约。现实是,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且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但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体量仍偏小,约占服务业的30%;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之于制造业仍相对滞后,部分生产性服务业负面清单有待缩减、自主开放度有待提高、准入与准营尚未完全同步。在政策上,服务业扩大开放是一项主动的“补短板”之举,通

过推进服务领域负面清单缩减、创新服务领域新业态和监管新模式,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协同提供制度支撑。由此,一方面,制造业可依托既有的产业基础与门类规模优势,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需求牵引与应用场景;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可通过引入和创新先进服务模式,补齐服务链规模和技术短板,增强其对制造业的专业化支撑力。上海的制造业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新模式便是例证。服务业和制造业应在要素配置、技术应用与链条嵌入层面融合协作,实现功能互补和共生发展,从而提升产业协同度。

依据雅各布斯的外部性理论,产业协同发展区凭借多样化的产业生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均衡区域就业等路径,充分发挥就业扩容的“乘数效应”。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就业创造与劳动力配置两个层面。在就业创造层面,服务业开放加速了产业生态的多元化,催生出大量弹性用工、平台经济等新型就业形态,这不仅形成了就业增长与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6],而且为劳动者开辟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在劳动力配置层面,高度的产业协同为劳动力要素的战略性再配置提供了便利。一方面,地理空间与产业链的协同打破了行业间的信息壁垒与技能藩篱,通过加速岗位信息传递与通用型技能趋同,降低了劳动者的就业搜寻成本与岗位转换门槛,推动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平滑流动;另一方面,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在平台企业或行业组织的参与下形成了更为灵活的劳动力配置方式,通过灵活用工等形式缓解了岗位周期性和季节性供需波动,进而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因此,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既是创造就业的“放大器”,也是稳定就业的“减震器”,二者共同作用,将产业协同效应内化为区域就业规模的实质性扩大。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5。

假说 5: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提高产业协同度来促进就业增长。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在捕捉与识别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上具有显著优势。鉴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启动时间不同,本文选择渐进双重差分法,从就业质量和就业数量两个维度切入,评估服务业扩大开放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促进效应。

1.就业质量。本文从劳动者个体层面评估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参考唐跃桓等(2025)的做法^[16],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satisfaction_{ict} = \alpha_0 + \alpha_1 open_{ct} + \alpha_2 Control_{it} + \mu_i + \lambda_t + \epsilon_{ict} \quad (1)$$

式(1)中, i 、 c 和 t 分别表示个体、地级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satisfaction_{ict}$ 为就业质量,选用 c 城市 i 受访者在第 t 年的工作满意度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 $open_{ct}$ 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如果城市 c 在第 t 年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将 $open_{ct}$ 赋值为 1,否则为 0。 α_1 衡量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 $Control_{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和 λ_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ϵ_{ict} 为随机扰动项。为尽可能避免因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借鉴毛宇飞等(2018)的研究^[17],从劳动者个人状况和工作性质等方面出发,依据 CFPS 调查问卷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城乡分类($urban$),城镇赋值为 1,农村赋值为 0;性别($gender$),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受教育程度(edu),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分别赋值为 1~4;健康状况($health$),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和非常健康分别赋值为 1~5;是否签订劳动合同($contract$),签订赋值为 1,未签订赋值为 0;当前婚姻状态($marriage$),有事实婚姻赋值为 1,无事实婚姻赋值为 0;晋升机会满意度($promotion$),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 1~5,无晋升机会赋值为 0;雇主性质($employ$),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赋值为 1,其他雇主类型赋值为 0。

2.就业数量。本文从城市层面评估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数量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quantity_{ct} = \beta_0 + \beta_1 open_{ct} + \beta_2 Control_{ct} + \mu_c + \lambda_t + \epsilon_{ct} \quad (2)$$

式(2)中,被解释变量 $quantity_{ct}$ 为就业数量,采用城镇本年新增就业人员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城市

就业数量。相较于城市总就业人员数等存量指标,该变量更能直接地反映就业市场的动态变化。核心解释变量 $open_{ct}$ 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 β_1 评估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效果。 $Control_{c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c 和 λ_t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ct} 为随机扰动项。

参考相关文献^{[8][18]},本文从城市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经济基础和生产效率等多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1)政府干预程度($govt$)。根据有为政府和财政挤入理论,采用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衡量政府干预程度。(2)产业结构(ind)。依据库兹涅兹产业结构理论,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征该城市的产业结构。(3)研发投入(rd)。根据公共研发正外部性理论,选取科学技术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表征研发投入强度。(4)城镇化程度($urba$)。根据大市场理论,利用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之比表示城镇化水平。(5)经济发展水平($RGDP$)。依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使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6)对外开放程度(ed)。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及雁阵理论,使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刻画城市对外开放水平。(7)全要素生产率(TFP)。根据内生增长理论,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计算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投入量选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从业人员数两个变量进行衡量,从业人员数以单位从业人员、私营及个体从业人员之和表征;产出量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之和来表示。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1.个体层面。本文使用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个体层面评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CFPS调查问卷在全国进行分阶段、多层次抽样,其数据代表性较强。劳动者是就业质量的感知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劳动年龄的规定和研究需要,剔除原始数据中年龄小于16岁的样本。对数据进行清洗合并后,最终得到6175个观测值。

2.城市层面。本文使用2010—2024年中国279个城市的数据,从城市层面评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效果。原始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城市或部分年份缺失的数据来自各地级市发布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工作报告,由作者手动整理获得。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与完整性,少数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最终本文得到4185个面板数据观测值。

五、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高质量充分就业两个维度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2)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质量的回归结果,列(3)(4)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数量的回归结果。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 变量 | 基准回归结果 | | | |
|----------------|----------------------|----------------------|-----------------------|----------------------|
| | 就业质量 (1) | 就业质量 (2) | 就业数量 (3) | 就业数量 (4) |
| $open$ | 0.129 ** (0.058) | 0.100 * (0.057) | 0.207 ** (0.102) | 0.243 ** (0.111) |
| 常数项 | 3.572 *** (0.002) | 2.530 *** (0.105) | 10.649 *** (0.001) | 8.743 *** (1.187) |
| 控制变量 | NO | YES | NO | YES |
| 时间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个体固定效应 | YES | YES | NO | NO |
| 城市固定效应 | NO | NO | YES | YES |
| 观测值 | 6175 | 6175 | 4185 | 4185 |
| R ² | 0.472 | 0.502 | 0.710 | 0.714 |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分别为个体层面(就业质量)、城市层面(就业数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为节省文章篇幅,表格并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表1第(1)(2)列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服务业扩大开放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例,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对就业满意度的作用(平均处理效应)为0.1,即相比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水平可以提升0.1。由表1第(3)(4)列可知,服务业扩大开放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就业数量。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例,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对就业数量的作用(平均处理效应)为0.243。这说明,相比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的就业数量可以增加0.243。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服务业扩大开放在微观层面显著提升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在中观层面显著提高了城市的就业数量。由此可见,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了高质量充分就业,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1。

(二)事前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事前趋势检验,将模型分别设置为:

$$satisfaction_{ict} = \gamma_{0i} + \sum_{-5}^3 \gamma_{1t} open_{ct} + \gamma_{2i} Control_{it} + \mu_i + \lambda_t + \epsilon_{ict} \quad (3)$$

$$quantity_{ct} = \delta_{0c} + \sum_{-6}^3 \delta_{1t} open_{ct} + \delta_{2c} Control_{ct} + \mu_c + \lambda_t + \epsilon_{ct} \quad (4)$$

式(3)(4)中,交互项系数 γ_{1t} 、 δ_{1t} 分别反映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实施的第 t 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就业质量和就业数量方面的差异,其余变量符号的含义与式(1)(2)相同。

本文分别对就业质量和就业数量开展事前趋势检验。借鉴 Li 等(2016)的做法^[19],对观测值较少的年份进行合并检验。同时,以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实施的前一年作为比较基准,因此忽略掉 $t = -1$ 的情况。图2和图3的结果显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实施前各期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说明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并无显著差异,未拒绝事前趋势平行的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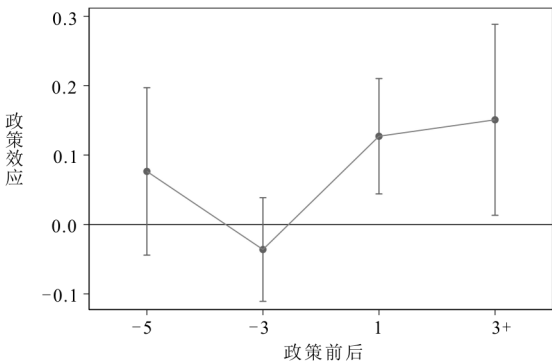


图2 事前趋势检验(就业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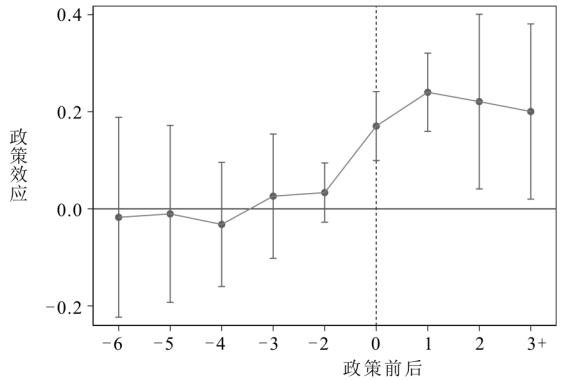


图3 事前趋势检验(就业数量)

(三)安慰剂检验^①

1.时间安慰剂检验。鉴于CFPS数据的发布周期为两年一次,为避免处理组个体和对照组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差异受到时间的影响,本文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的实施时间分别提前2年、4年和6年进行反事实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政策提前2年、4年和6年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处理组个体和对照组个体的时间趋势无系统性差异,验证了就业质量层面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个体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通过随机替换处理组个体进行安慰剂检验。按照全部试点城市包含的个体样本数量,本文随机抽取155个个体作为虚假处理组,其余个体作为虚假对照组,以此估计解释变量的系数。对上述过程重复500次,并绘制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分布图。结果发现,回归系数趋于零且服从正态分布,这说明估计系数不显著(与零无差异),就业质量层面的基准回归结果并非偶然因素所致。

3.城市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通过随机替换处理组城市进行安慰剂检验。按照样本期内试点城市的数量,随机抽取13个城市作为虚假处理组,其余城市作为虚假对照组,以此估计解释变量的系数。对上述过程重复500次,并绘制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分布图。结果发现,回归

系数趋于零且服从正态分布,这表明估计系数不显著(与零无差异),就业数量层面的基准回归结果并非偶然因素所致。

(四)稳健性检验^①

1.改变模型条件。为了进一步控制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对模型和样本进行调整:第一,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劳动者年龄(*age*)以控制个体层面年龄差距的影响;第二,将CFPS样本期前溯至2010年,形成一个覆盖更长时期的面板数据,以期排除特定时期事件对研究结论的偶然性影响。在基准回归模型(2)的基础上,本文分别进行两种调整:第一,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劳动力流动(*labor*)以控制城市层面劳动力供求因素的影响,选用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表示;第二,采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UE*)作为城市就业数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改变上述条件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与基准回归并无明显差异。

2.排除其他政策干扰。通过整理和分析文件发现,城市就业水平可能会受到同时期《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关于开展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商贸流通专项)的通知》两项政策的干扰。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2)中,分别加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FDD*)和商贸流通标准化专项试点(*SDD*)政策两个虚拟变量,以排除同期政策干扰。结果发现,排除两项政策干扰后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验证了就业数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事前趋势假设敏感性检验。Rambachan和Roth(2023)提出了一种检验违反事前趋势假设的方法^[20],其核心思想是对处理后点估计量的置信区间展开敏感性分析。本文设置最大偏差度 $Mbar=1\times$ 标准误,以检验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实施后,处理效应对事前趋势偏离的敏感性。结果发现,在平滑限制下,即使偏离标准误40%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对就业数量的促进效应依然稳健。可见,即使事前趋势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本文的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成立。

4.异质性处理效应。由于政策在不同城市实施的时点存在差异,需要采用Bacon分解、CSDID检验来测试回归结果是否受到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影响。第一,进行Bacon分解。参考Goodman-Bacon(2021)的做法^[21],将渐进DID估计量分解为三对,包括“处置组和从未处置组”“早处置组和晚处置组”“晚处置组和早处置组”。基于上述分解,可能的时变异质性处理效应主要来自 2×2 DID类别“晚处置组和早处置组”,该类别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35,但在整体估计量中权重相对较小,仅为0.3%。这说明,时变异质性处理效应对DID估计结果的影响并不严重,本文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改用CSDID检验。借鉴Callaway和Sant'Anna(2021)的做法^[22],采用CSDID检验来考察渐进DID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两个维度,从工作胜任力、收入获得感、就业吸纳力和产业协同度四个方面入手,分别检验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机制。

1.工作胜任力(*JC*)。依据Spencer等(1993)提出的胜任力框架^[23],工作胜任力包括知识、经验及技能等维度的积累和匹配。服务业扩大开放加剧了国际人才和本土人才以及本土人才之间在高技能服务供给市场的竞争,倒逼本土人才通过“干中学”(此类学习效应是工作年限或时长的函数)、强化在职培训和提升学历教育等方式在劳动力市场发送高胜任力信号,以获取更为优质的就业机会。为此,本文基于工作年限与学历匹配度两个方面,构建工作胜任力指数以衡量劳动者的工作胜任力。其中,工作年限采用CFPS调查问卷中劳动者的实际年龄与取得最高学历的年龄之差来衡量;学历匹配度利用CFPS调查问卷中劳动者当前最高学历与胜任工作的教育程度之差来表示。表2第(1)列显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劳动者工作胜任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依据工作特征模型,更强的工作胜任力能够增加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和技能多样性,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的工作适应性和满意度。这说明,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提升劳动者工作胜任力改善了就业质量,验证了研究假说2。

| 变量 | 工作胜任力 | 收入获得感 | 就业吸纳力 | 产业协同度 |
|----------------|--------------------|----------------------|--------------------|--------------------|
| | (1) | (2) | (3) | (4) |
| <i>open</i> | 0.137 * (0.072) | 0.058 *** (0.011) | 0.384 * (0.225) | 0.054 * (0.032)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 时间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个体固定效应 | YES | YES | NO | NO |
| 城市固定效应 | NO | NO | YES | YES |
| 观测值 | 1794 | 4090 | 4180 | 3906 |
| R ² | 0.158 | 0.361 | 0.921 | 0.805 |

2.收入获得感(IA)。依据 Kakwani 指数的测度方法,本文基于 CFPS 调查问卷中劳动者工作总收入指标构建相对剥夺指数,将其正向化处理后作为收入获得感的代理变量。表 2 第(2)列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收入获得感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根据心理契约理论,收入获得感的提高强化了劳动者与组织之间隐性的、相互期望的心理契约关系,进而提升其工作满意度。这表明,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增强收入获得感提升了就业质量,验证了研究假说 3。

3.就业吸纳力(EA)。参考齐鹰飞和管鑫(2025)的做法^[24],本文使用全国工商注册数据中,各个地区每年新注册服务业企业的数量来衡量城市的就业吸纳力,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表 2 第(3)列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城市就业吸纳力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根据产业关联及推拉理论,城市核心产业的就业吸纳力通过后向、前向和旁侧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及配套产业就业扩张,进而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更大空间和更多选择。这说明,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提升就业吸纳力促进了城市就业,验证了研究假说 4。

4.产业协同度(IS)。借鉴崔书会(2019)的做法^[25],本文采用式(5)来衡量产业协同度,计算公式如下:

$$IS = 1 - \frac{|aggm - aggps|}{|aggm + aggps|} + (aggm + aggps) \quad (5)$$

式(5)中,IS 为产业协同度指数,其值越大,代表该城市的产业协同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城市的产业协同水平越低。aggm 和 aggps 分别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具体采用区位熵值法来测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表 2 第(4)列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产业协同度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依据雅各布斯的外部性理论,产业协同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均衡区域就业等方式,发挥就业扩容的“乘数效应”。这表明,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提高产业协同度推动了就业增长,验证了研究假说 5。

为了避免单一衡量指标造成的结果随机性,本文替换机制变量的衡量方式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同样验证了当前机制检验的结论^①。

(二)异质性分析

1.居住地变动(*place*)。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常住人口拥有更丰富的本地社会资源与关系网络,能更大程度地获取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政策红利。通过观察居住地变动情况,可识别 2014—2022 年劳动者的迁移经历。根据 CFPS 调查问卷中的省国标码,将发生过居住地变动的流动人口赋值为 1,常住人口赋值为 0。表 3 第(1)列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属性弱化了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常住人口拥有的本地社会人脉资源和社会网络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它与服务业扩大开放带来的正式制度变迁形成互补,助推常住人口在服务市场中获取更加优质的就业通道及岗位。此外,常住人口尤其是本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更近,更容易获得信任,对外沟通成本更低。跨国服务企业在物色高层次代理人时往往会存在本地化偏好,给予本地常住人口更多优质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就业质量。

表 3

异质性分析

| 变量 | 居住地变动 | 城市海外关联 | 要素市场成熟度 |
|------------------------------|----------------------|--------------------|----------------------|
| | 就业质量 | 就业数量 | 就业数量 |
| | (1) | (2) | (3) |
| <i>open</i> | 0.121 ** (0.061) | 0.232 * (0.127) | 0.435 * (0.223) |
| <i>open</i> × <i>place</i> | -0.571 ** (0.228) | | |
| <i>open</i> × <i>abroad</i> | | 0.268 * (0.155) | |
| <i>open</i> × <i>element</i> | | | 0.110 *** (0.018)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 时间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 个体固定效应 | YES | NO | NO |
| 城市固定效应 | NO | YES | YES |
| 省份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 观测值 | 6116 | 4185 | 4185 |
| R ² | 0.523 | 0.714 | 0.134 |

2.城市海外关联(*abroad*)。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侨乡城市凭借优质海外华侨资源和对外开放传统,更能充分发挥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就业带动作用。参考傅联英等(2025)的做法^[8],将海外关联度较高的侨乡城市赋值为1,其余城市赋值为0。表3第(2)列的结果显示,服务业扩大开放能够更强劲地提高侨乡城市的就业数量。其原因可能是:海外关联度高的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华侨资源和对外开放传统,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带动就业提供了先发的国际化优势。海外华裔较早嵌入全球网络并拥有国际国内双重资源,华商企业以“侨”为桥回乡投资兴业,原本为其提供服务的跨国生产性服务业也随之进入侨乡,为侨乡创造各种业态的就业机会。

3.要素市场成熟度(*element*)。依据有效市场理论,要素市场发育成熟的地区信息更透明、摩擦成本更低、资源配置效率更高,服务业扩大开放带来的就业提升效能更大。在王小鲁等(2021)的省级市场化指数基础上^[26],本文将各城市GDP占所在省份GDP的比重作为权重,分解出地级市层面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得分以衡量地级市要素市场的成熟度。此外,2020—2024年的成熟度指标以1997—2019年的平均增长幅度为基础外推得到。表3第(3)列结果显示,在要素市场更成熟的地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大。其原因可能是:在要素市场发育更成熟的城市,健全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充分的劳动力信息交流降低了劳动者与服务岗位之间的搜寻及匹配成本,服务业扩大开放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容易被劳动力市场及时、高效地吸收。此外,服务业门类丰富、业态多样,要素市场发育越成熟,要素间的组合配置机会就越多,这有助于强化服务业固有的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从而更加充分地释放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就业的吸纳与创造潜力。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CFPS个体层面数据,以及2010—2024年中国279个地级市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效应,并检验了其传导机制与影响差异性,研究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相比非试点城市,该政策的推行会显著提升试点城市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增加试点城市就业数量。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成立。第二,服务业扩大开放通过提升工作胜任力、增强收入获得感、提升就业吸纳力和提高产业协同度四个方面间接促进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第三,服务业扩大开放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性。服务业扩大开放主要提升了常住人口的就业质量,显著增加了侨乡、要素市场成熟度高的城市就业数量。

依据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直接效应与作用机理,本文提出政策启示。第一,持

续提升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建议政府在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范围的基础上,结合各地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分类制定开放任务清单。同时,需完善配套风险防控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人才引进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差异化政策支持,提高制度供给的协同效率。通过这种精准化、差异化的开放路径,激发各试点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潜力,从而有效地拉动就业增长,并为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积累更多可复制的经验。第二,加快培育服务业新形态,打造发展新动能。在服务业扩大开放背景下,消费者高端服务需求驱使服务业企业进一步加快新业态发展。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各地应在数字贸易、智慧医疗和在线教育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新业态集群。这类新形态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线下融合创造灵活就业空间,可以有效扩大城市就业容量。同时,各地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中小服务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大中小企业构建跨界融合的新服务场景,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提供动能。第三,推动服务产业深度融合,释放发展新活力。各地应推动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产业协同效应。以产业链为主线,企业应在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与品牌营销等环节加强跨行业协作,增进上下游企业的制度协同与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共享能力。在此基础上,各地可将服务业扩大开放与重点产业链培育相衔接,通过发展高附加值服务环节和强化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提高就业岗位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从而优化就业结构并促进就业增长。

注释:

①具体回归结果因篇幅限制,留存备案。

②本文选取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参考文献:

- [1] 莫荣,李付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1):3-8.
- [2] 赖德胜,胡起源.“十五五”时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形势与政策体系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25(10):11-24.
- [3] Eurofound. Trends in Job Quality in Europe[M].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2:6-10.
- [4] Green, F. Demanding Work: The Paradox of Job Quality in the Affluent Economy[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1-23.
- [5] Konan, D. E., Maskus, K. E.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81(1): 142-162.
- [6] 陈健,余翠萍.中国服务进口技术外溢的就业效应及其就业增长技能偏向性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11):61-66.
- [7] 谭洪波.全球化分工“治愈”了鲍莫尔成本病吗?——以美、中、印三国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2018(2):145-151.
- [8] 傅联英,牛怡苏,魏莉莉.服务业扩大开放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政策效能[J].经济纵横,2025(2):49-61.
- [9] 孙湘湘,周小亮.服务业对外开放、结构变迁与就业[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7):94-105.
- [10] 苏丹妮,邵朝对.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J].财贸经济,2021(1):151-164.
- [11] 齐文浩,李颺,邱阳.服务业开放阻碍制造业就业了吗: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3(12):38-48.
- [12] 李颺,蔡宏波.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就业结构[J].国际贸易问题,2021(6):143-158.
- [13] 陈勇兵,胡佳雯,杜雨蕊,等.外资进入促进了就业净增长——来自中国外资准入限制放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4(3):793-809.
- [14] Hackman, J. R., Oldham, G. R. Motiv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of Work: Test of a Theory[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76, 16(2): 250-279.
- [15] 王积超,闫威.相对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获得感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10):119-128.
- [16] 唐跃桓,黎静霖,杨其静.电子商务与企业跨地区交易: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5(1):74-90.

[17] 毛宇飞,曾湘泉,胡文馨.互联网使用能否减小性别工资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18(7):33-45.

[18] 王玉琴,刘成奎,王浩.城市绿色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1):45-57.

[19] Li, P., Lu, Y.,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3(1): 18-37.

[20] Rambachan, A., Roth, J. A More Credible Approach to Parallel Trend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3, 90(5): 2555-2591.

[21] 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254-277.

[22] Callaway, B., Sant'Anna, P. H. C.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200-230.

[23] Spencer, L. M., Spencer, S. M. Competence at Work: 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3: 91-156.

[24] 齐鹰飞,管鑫.市场统一如何促进企业吸纳就业?——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准自然实验[J].财经研究,2025(1):33-47.

[25] 崔书会,李光勤,豆建民,等.产业协同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研究[J].统计研究,2019(2):76-87.

[26] 王小鲁,胡李鹏,樊纲.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23-248.

Joint Promotion Both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Opening-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on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NIU Yisu FU Lianying CAI 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e opening-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engine and key path to realize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opening up the service industry promotes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focusing on both employment quality and quantit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Using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and prefecture-level city data, it trea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pilot policies for opening up the service industr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 increment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is employed to separately assess the policy's impact on employment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opening-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After undergo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show that the opening-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directly promotes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by optimizing job competence, enhancing the sense of income attainment, strengthening employment absorption, and enhancing industrial synergy.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 that the opening-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primarily enhanced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for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quantity of employment in overseas Chinese and cities with high factor market sophistication. The findings enrich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stable employment" effect of the opening-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for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opening-up patter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realizing higher quality and fuller employment.

Key words: Opening-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Job Competence; Income Attainment; Employment Absorption; Industrial Synergy

(责任编辑:易会文)